

第 1949 年~1966 年

第一章

会计理论的初步形成阶段

第一节 1949 年~1966 年会计理论的发展线索

1949 年以前，我国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国家会计理论的影响。建国初期，会计学术界受到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开始清除西方会计理论和方法，批判和改造当时已经形成的会计

思想，并逐步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不少苏联会计专家来到中国，帮助我们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的统一会计制度。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一些相当重要的会计思想和理论，并为新中国会计理论的建立和发展确立了一个粗略的框架。

从发展的特征看，这一阶段的会计理论大体上有两条发展线索可循。一是批判和改造旧有的会计思想和方法以及旧中国会计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具体表现为吸收和改造我们固有的收付记帐法以及从西方国家引入的旧有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二是引入了苏联社会主义会计学理论和方法，表现为当时的会计理论界翻译和学习了苏联大量的会计核算原理教科书，对我国社会主义会计理论的形成和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的会计逐步向苏联社会主义会计理论和方法靠拢。当时，影响最大的一本会计著作就是苏联专家弗·哥·马卡洛夫所著的《簿记核算原理》。

这一时期，我国会计理论界对于一些重要问题的论争以及在论争中所产生的会计观点，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两条线索而引起的。例如 邢宗江、黄寿宸(1951)发表了《怎样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夏高波(1951)发表了《新中国会计往哪儿去》，陶德(1951)发表了《〈怎样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读后》，李守洪(1951)发表了《关于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的我见》，陈重丞(1951)发表了《会计学的科学与阶级属性》，相义恭等(1951)发表了《会计学的阶级性和历史任务》，胡宗德(1951)发表了《关于〈怎样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的一些意见》，章乃器(1950a,1950b)发表了《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帐》和《再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帐》，中国人民大学簿记核算教研室(1953)发表了《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簿记核算的基本原则》等文章，以及上海财经学院(现为上海财经大学)下同会计教研组编写的《会计核算原理》，李天民编著的《审计学教程》，郭森麒、梁倩恩编译的《工业会计》，王逢辛、刘文泉编著的《新会计学教程》，潘序伦、俞文青

编著的《国营企业会计概要》余肇池编著的《国营企业会计》伍铭所编的《经济核算论文选集》，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编写的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会计原理》等主要偏重于批判、改造和吸收旧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借鉴和吸收苏联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建立新中国的会计理论体系。

此外，这一时期对一些重要会计理论问题的论争，如会计学的属性、会计记帐方法、会计的职能、地位、作用、对象、性质、方法等其他基本会计理论问题，基本上是以上述两条发展线索为阵营而展开的。再如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如邢宗江、黄寿宸关于社会主义的会计理论应建立在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的观点，余肇池关于社会主义会计特点的论述，陶德关于会计“生产力”属性的论述，陈重丞关于会计学具有两重性的论述，葛家澎关于社会主义会计对象、经济核算与价值规律相联系的论述，财政部关于社会主义会计等式采用资金运用等于资金来源的观点，李先念关于人民公社需要经济核算的论述，许毅关于经济核算的论述，阎伯臣关于财产收付记帐法的论述，商业部关于增减记帐法的论述，谈惠关于会计职能的论述，等等，基本上也是循着上述这两条发展线索在有关问题上进行探索和争论而产生的。

在这一发展阶段，由于对如何建立新中国的会计理论尚处在探索之中，会计理论界基本上还是比较活跃的，各种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的争论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呈现出会计事业兴旺发达、蒸蒸日上的景象，初步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会计理论，为建立我国分所有制和跨行业的统一会计制度奠定了基础。

虽然从总体上说，这一阶段的会计理论研究比较活跃，但在其中不同时期仍体现出一定的差异。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中国人民大学邢宗江、黄寿宸（1951）两位教授在《新会计》创刊号上首先提出了怎样建立新中国会

计理论基础的问题。他们在文章中对该问题的回答是：将会计理论建立在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坚决肃清资本主义会计理论的残余影响，整个地学习与接受苏联先进的会计理论。针对“坚决肃清”和“全盘接受”的这一观点，李守洪（1951）提出了不同意见，“我同意新中国的会计理论建立在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上，但是同时必须考虑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对于坚决肃清资本主义会计理论的残余影响一点，我主张根据毛泽东思想去批判旧有的会计理论，而不是全部的肃清和否定”，“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社会主义的会计理论，尽量地去吸收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的经验，以作为我们由新民主主义经济步入社会主义经济的工具。但是必须要灵活地运用而不是不消化地全部搬来照用”。这种争论对于活跃会计理论研究空气、建立新中国的会计理论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 1952 年至 1956 年这一阶段，以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的会计实务为主，除了少量提倡我国会计制度必须全面学习苏联的理论与实务的文章外，真正的会计理论研究文章并不多见，大量出现的是会计教科书。究其原因，“是由于社会主义会计与资本主义会计存在根本的区别，这门学科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研究会计的同志们大都要从头学起，很少有可以发表的心得；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教条主义占上风，妨碍了学术讨论的开展”（《工业会计》编辑部 1956）。

从 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指导思想，会计界也开始受到一定的影响，会计理论研究更多地带有政治色彩。当时，甚至将学术争论演变成了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反右运动与“百家争鸣”均对会计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49 年～1966 年这一时期的会计研究，还体现出会计学本身的特殊性。其他一些经济学科，在表述重要观点的论文发表后，很快就可形成有影响的专著，然而，由于会计学具有很强的应用性，除了讨论会计的科学属性和职能等基本理论之外，大多数论文都是讨论会

计方法的，因而很少形成有影响的专著，这体现了会计学主要是一门方法性学科的特点。^①这段时间有许多文章是关于记帐方法的，如章乃猷(1950a)发表的《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帐》阎伯臣(1962)发表的《关于记帐方法的探讨》阎伯臣等(1964)发表的《谈谈财产收付记帐法》雷萌、刘杰修(1964)发表的《对财产收付记帐法的几点意见》，向群(1964)发表的《“增减记帐法”的初步研究》殷宗鹗(1965)发表的《对记帐方法理论基础的初步意见》赵景锸(1965)发表的《增减记帐法和财产收付记帐法哪个好》，商业部财务会计局(1966)发表的《我们是怎样改掉借贷记帐法实行增减记帐法的》，潘遥(1966)发表的《彻底打破洋教条建立社会主义的记帐方法》等等。但也有个别文章是讨论财务监督的，如邢宗江、王景新(1960)发表的《财务监督的性质与作用》。此外，大量的文章是关于会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商讨”涉及结算方式与流动资金运用、资金的定额管理、财务计划、经济活动分析、经济核算制、班组核算等。实务性要强于理论性，理论价值并不高。

第二节 1949年~1966年会计理论研究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百废待兴，出现了一个新旧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转换阶段。与此相适应，会计也亟需转轨变型，即从旧中国分散、落后、各自为政的会计转变为全国基本统一的现代会计，从主要学习西方会计理论方法转向主要学习苏联社会主义会计理论方法。这种转变，在会计理论研究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会计学是一门方法性的学科，侧重于记帐、算帐和报帐，但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会计并不仅仅是方法，它是工商管理学科的一个分支，也是一种管理活动。

方面，较为突出地反映在如下几个问题上：一是关于会计的科学属性问题，二是关于会计记帐方法，三是对会计职能的讨论，四是会计基本理论的建设。通过对这些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再加上苏联会计模式的影响，在改造和吸收旧理论中有用成分的基础上，开始初步形成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会计理论。

这一时期的会计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所涉及的面还不够广，参与的人也不多，其时代特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深受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对会计的科学属性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

会计的科学属性，即会计的特性，可以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去考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阶级社会里，最重要的是从社会角度去研究和认识会计的属性，即会计有无阶级性。因而，会计科学属性问题实际上即成为会计有无阶级性的论争。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性质决定会计的特点，会计理论也就成为社会经济性质的反映，即会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邢宗江，黄寿宸 1951）也有人表示反对，认为与其说会计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毋宁说它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会计理论基本上是一种经过实际经验和长期研究所产生的有系统的会计知识（陶德 1951）。除了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之外，也有学者从分析会计的基本方程式（资产 - 负债 = 资本）出发，认为等式本身属于自然科学，而等式所反映的资金循环运动的货币价值观念则属于社会科学。因此，会计具有双重属性（陈重丞 1951）。

在这段时期内，学术界围绕会计的阶级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逐渐形成了会计具有阶级性、会计具有技术性和会计具有两重性这样三种观点，呈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在 50 年代末，这种学术争论受政治运动的严重影响，出现了会计具有强烈阶级性

的一边倒的倾向，会计具有技术性和两重性的观点销声匿迹。会计的科学属性之争完全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支配。到了 60 年代初才又重新出现了会计具有两重性的观点。

二、学术研究偏重于对会计记帐方法的探索

建国初期，多数会计学者认为，会计就是反映，而反映就是记帐方法。所以，开展会计学术的讨论，记帐方法往往就占据中心的地位。当时成为争论焦点的记帐方法有收付记帐法、借贷记帐法和增减记帐法三种。借贷记帐法起源于 500 多年前的意大利，以后在世界大多数国家被广泛应用，在旧中国也曾作为西式簿记被引进我国，在一些工商企业使用，而收付记帐法在旧中国应用较为广泛。因此，建国后新中国应采用何种会计记帐方法引起了会计界的积极讨论。

对记帐方法的讨论，是由 1950 年 1 月《大公报》等报纸先后发表章乃器先生《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帐》等两篇文章引起的。作者主张采用收付记帐法，认为应该使用自己原有的簿记原理记帐，因为这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也有观点认为收付记帐法具有简便的优点，而且吸收了借贷簿记的一些优点，不能彻底否定（夏高波 1951）对此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指出，收付记帐法在理论上是不够健全的，它使记帐人员停留在狭隘的现金观点上，不能追求更高的发展，它的应用，只限于有现金收付行为的交易。收付记帐法是一种原始的记帐方法，在簿记方法尚未发展至复式借贷以前，记帐的方法就是记收付（张道传等 1951）。

50 年代初，经过一段时期的“收付与借贷”的争论，结果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借贷记帐法既科学又严密应该得到肯定。就此借贷记帐法在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记帐方法。关于记帐方法的争论也暂时告一段落，直到 60 年代初，关于记帐方法的争论才又成为会计研究的一个热点，而且又涉及会

记等式，最终还导致了增减记帐法的诞生。

1962年第9期《经济研究》刊登了《关于记帐方法的探讨》一文，对建国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借贷记帐法提出了质疑，作者主张采用“财产收付记帐法”认为“财产收付记帐法”不仅有群众性而且也是具有独立体系、结构严密的记帐方法，它能够系统反映客观实际情况（阎伯臣 1962）。其后作者又在《谈谈财产收付记帐法》一文中再一次明确了关于收付记帐法的两个主要观点。一是认为财产、财务收入和财务支出的分类法符合客观经济情况，主张用“收入—支出=结存”的平衡公式代替“资金运用=资金来源”的平衡公式。二是认为“同收、同付”的记帐方法符合经济事务变化的客观规律（阎伯臣等 1964）

但也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金运用=资金来源”的平衡公式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产=负债+资本”的平衡公式是有本质区别的，不能把“资金运用=资金来源”的平衡公式当作旧东西推翻。而“收入—支出=结存”的平衡公式本身是不正确的，因为收入和支出是概括不了结算中的资金和债务这样一些内容的。同时，“同收、同付”记帐法在帐户处理上容易发生错误不利于平时核对帐目（雷萌 刘杰修 1964）。

当时会计界反对借贷记帐法的主要理由是：“借贷”两字晦涩难懂不符合民族习惯不利于群众监督。因此有人建议：“借贷”两字可以改用“收付”、“左右”等其他记帐符号但是借贷记帐法的内容（即“资金运用=资金来源”和借贷记帐法的记帐规则即“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不能改变。

正当借贷、收付之争达到白热化程度之时，商业部门在1964年提出了一种新的记帐方法，即增减记帐法。有关增减记帐法的观点及内容将在本章第三节阐述。这场有关会计记帐方法的大争论，导致借贷记帐法退出主导地位，而增减记帐法则得到了肯定（1964年第四

季度增减记帐法开始在商业部系统选点试行，并取得了成功。1965年开始在全国商业部门全面推行，以后又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基建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成为我国当时推行面最为广泛的一种记帐方法。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使得增减记帐法在一段时期内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并基本上被会计理论界所认可。

三、为充分发挥会计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对会计职能作了初步探讨

建国初期，我国会计界曾经提到过会计职能的内容，但没有明确提出“会计职能”这一概念。明确提出“会计职能”概念并最早研究和讨论会计职能，发生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出现了有关会计职能的两种主要观点，即一职能说和二职能说。

所谓一职能说，指会计不过是生产过程的物量反映，只有“反映”的职能。二职能说根据马克思所作的会计是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论断，认为会计有“反映”和“监督”或“反映”和“控制”两种职能。

还有人阐述了反映和监督两种职能之间的关系，认为“会计核算有两大职能，一是反映，一是监督。反映和监督都是以货币为形式来进行的，是以货币形式来反映和监督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和经营成果的一种科学方法。反映是监督的基础，没有正确、全面、及时的反映，不把帐记好、算好，就不可能进行监督”（朝阳，1962）。

60年代初，由于我国国民经济处于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时期，需要充分发挥包括会计监督在内的各种经济监督手段的作用，从此开始，会计具有反映和监督两项职能的观点就逐步为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所接受。

四、为进一步指导实践，总结新中国会计的实践，并抽象和上升为会计理论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末期，人们对建国以来的会计工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和反思，认为当时的会计制度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会计制度，有一些方法繁琐复杂不切实际，许多会计工作重复、无效；二是帐簿报表难用难懂，如一度推行的凭单日记帐；三是在核算上存在不少形式主义和单一化倾向，例如不问企业规模大小，不分行业特点，会计核算制度都是一套办法、一个要求；四是会计科目过多、过细，不利于核算。

针对这些问题，会计界进行了研究和讨论，认为会计必须不断地改革，以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对会计科目的精简，会计报表体系的改进，分行业会计制度的研究，以及对会计记帐方法、会计职能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我国的会计理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会计实务也趋于完善。但从整体而言，会计理论远未成体系。

60年代初，会计理论界还对如何正确处理会计制度的破与立、繁与简的关系，如何处理会计工作中服务与监督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开始进行会计理论的总结。最能体现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是，由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编写的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会计原理》。此书由杨纪琬、娄尔行、葛家澎、赵玉珉和吴诚之五位著名的会计专家编写，于1963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它基本上反映了我国会计界当时对会计的地位、作用、对象、任务、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是对建国以来近15年会计工作实践和经验的理论总结，对当时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该书指出了会计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计对于促进生产建设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会计是有计划管理社会主义经济、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其次，会计是厉行增

产节约、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最后 会计还是保护社会主义财产的一个重要工具”。

此书指出了会计对象，“会计的对象是指会计所要反映和监督的内容而言。概括说来 就是在企业、事业、机关等单位中能够用货币表现的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以及社会主义财产”。

该书还阐述了会计的任务，“社会主义会计的任务，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要正确地、及时地、完整地记录和反映企业、事业、机关等单位的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情况，为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提供准确可靠的会计核算资料。(2)要在反映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情况的同时，实行会计监督，以促进国家政策、法令、制度的贯彻实施。(3)要充分利用会计核算资料及其他有关资料分析和检查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情况，总结经营管理的先进经验，挖掘增产节约的潜力，揭露铺张浪费和违法乱纪的行为，以便采取措施，改进工作”。

该书指出“会计的方法 是用来反映和监督会计对象 执行和完成会计任务的手段。会计的方法应当区分为会计核算的方法、会计分析的方法和会计检查的方法。会计核算的方法主要包括：设置帐户、复式记帐、填制和审核凭证、登记帐簿、成本核算、财产清查、编制资金平衡表和其他会计报表”。

总之，由于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会计研究主要侧重于如何对旧中国的会计理论和方法进行批判和改造，如何建立新中国的会计理论体系，以及如何总结新中国会计工作的经验。对会计科学属性的争论说明了是否需要改造和批判旧中国会计理论和方法，而有关记帐方法的争论看起来是方法问题，实质上还是与会计的属性存在着一定联系。

第三节 1949 年~1966 年期间的理论创新

1949 年~1966 年期间,我国会计学界受苏联会计体系的影响,又受“左”的指导思想及政治运动的干扰,同时存在着重实务轻理论的倾向,会计理论研究工作并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但也有一些会计学者坚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会计学的个别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和创新,推动了社会主义会计学的发展。

一、会计的两重性

从 50 年代初起,对会计的属性就有争论,最早受苏联会计的影响,只提会计的阶级性,不提会计的技术性,以后又有人提出会计只有技术性。陈重丞(1951)从分析会计的基本方程式(资产-负债=资本)出发,认为会计等式本身属于自然科学,而等式所反映的资金循环运动的货币价值观念则属于社会科学。因此,会计具有双重属性。但这一观点以及论证方法本身在当时并没有被广泛接受。

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会计具有阶级性的观点支配了整个 50 年代的会计学术界。进入到 60 年代,会计两重性才开始被接受和传播。1963 年高等财经院校会计教材编写组编著的《会计原理》中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会计不但有一定的技术性 而且还有阶级性”这一观点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1964 年葛家澎在《试论会计的阶级性》一文中指出,在会计的方法中,有的同生产技术一面的联系多一些,有的则少一些。同生产技术一面联系多一些的方法会带有较为明显的技术性。而同生产技术一面联系少的方法则带有明显的阶级性。会计,作为一个反映和监督生产过程的方法总体,既有技术性,又有阶级性。

虽然当时强调的还是会计的阶级性，但会计具有两重性的观点无疑对构筑我国会计学体系和吸收国外（包括西方）会计理论和方法具有重大的意义。至少社会主义会计和资本主义会计不是完全对立、相互排斥的，相反在一些技术方法上是可以相同的。70年代末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处于恢复阶段，开始吸收西方和苏联有益于我国经济建设会计理论研究成果，并纳入自己的会计学体系，这是与会计具有两重性的观点在我国基本上被接受和传播分不开的。从80年代起，较多的是强调会计有技术性的一面，但仍承认其有阶级性的一面。同样，西方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吸收及其程度也与这一观点的认可程度密切相关。到了90年代，已经很少有人提到会计的阶级性，对西方会计理论和方法采取的是批判地吸收的态度，并提出了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的主张。

二、增减记帐法

会计就是反映，而反映就是记帐方法。这种论点在当时会计学界很有市场，因而记帐方法始终是会计学术研讨的热点之一。收付记帐法在建国前已存在，借贷记帐法从西方国家引进，并在建国初期使用。先是50年代初章乃器提出要采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收付记帐法，然后张道传等（1951）反对使用收付记帐法，最后借贷记帐法取得了主导地位。60年代初，又对记帐方法进行了讨论，借贷记帐法和收付记帐法之争达到白热化程度。但在1964年商业部门却提出了一种新的记帐方法，即增减记帐法。这种记帐方法是“根据社会主义会计核算应当通过对资金增减变化的记载来反映和监督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经济活动情况的要求，以经营资金运用等于经营资金来源的原理为基础运用‘增减’这两个记帐符号直接反映资金的增减变化情况”（向群 1964）。

1965年，赵景镔又撰文阐述了增减记帐法的记帐原理，指出“

减记帐法以经营资金运用等于经营资金来源的原理为基础，将帐户固定划分为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两大类。关系到两类帐户的会计事项，记同增或同减；只涉及同类帐户的会计事项，记有增有减。同时，利用两类帐户余额进行试算平衡。增减记帐法采用了同增、同减，有增有减的记帐规则（赵景锸 1965）。

作为增减记帐法主要设计者之一的张以宽教授认为，“增减记帐法是能够如实反映资金运动过程及其结果的，而且通俗易懂”（张以宽 1979）。张以宽教授根据实践经验撰写了《增减记帐法》一书该书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增减记帐法的理论与实务，于 1980 年 4 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以后，流传于国外，曾两度被日本会计学者翻译出版。

虽然增减记帐法存在着记帐规则和理论基础不一致以及记帐规则不易掌握等缺点，以后又被借贷记帐法所取代^①但它确实比借贷记帐法通俗易懂，是我国会计学界在总结会计实践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并曾在商业部门被广泛应用，在一段时间里丰富了会计记帐方法。

^① 1992 年 11 月财政部颁布 1993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八章规定，“会计记帐采用借贷记帐法”。这意味着增减记帐法不再被采用。

第 1966 年~1978 年 第二章 会计理论的停滞发展阶段

第一节 1966 年~1978 年会计理论的停滞发展

1949 年至 1966 年这段时期，我国会计理论界在总结会计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点的会计理论、概念和方法，并对会计制度的制定和会计实践的进步

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当理论界巩固已有的成绩，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会计改革，推动会计工作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会计领域和其他经济、文化、科学领域一样都遭受了一次巨大的浩劫，基本上已不存在会计理论的研究。建国以来会计理论研究的两条发展线索由此中断。

“文化大革命”对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冲击和破坏是空前的。在“要算政治帐，不要算经济帐”、“三年不算帐，钱也跑不到外国去”，“核算无用”，取消会计核算”等谬论的传播和影响下，财政部的会计制度管理机构被撤销，各级主管部门的财务会计管理机构被撤并，会计制度几乎被横扫一空。许多单位的财务会计工作陷入无管理、无控制的状态，企业、事业单位财会人员被大批下放劳动，财务会计工作处于十分混乱和半瘫痪的状态。

与此同时，会计理论界的一些著名专家、教授被错误地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劳动，有的甚至遭受人身迫害。所有会计杂志被勒令停办，编辑人员被遣散。由财政部主办的、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会计》杂志在其第 7 期刊登的暂停出版启示可以说明当时会计杂志的遭遇：“为了使编辑部集中力量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请示领导批准，本刊决定从 1966 年第 8 期（总第 26 期）起暂停出版。”实际上，《会计》杂志 1966 年第 7 期刊登的已没有一篇会计文章，而全部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宣言。绝大部分财经类大中专院校被撤销、停办。这造成以后一段时间内我国会计人才后继无人、青黄不接，会计理论研究中断，会计事业几近消亡。

在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下，正常的学术争鸣被扼杀，会计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突出政治，坚决破除会计制度中的烦琐哲学”成了当时的重要口号（《会计》杂志社论 1966）。由于过分强调会计的阶级性，阶级斗争几乎取代了全部会计工作，人们也不可能以科学的态度来探讨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会计理论进入了停

滞发展时期 在某一段时间里 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在“文革”十年里，几乎没有出现过任何会计理论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只是在“文革”的后期，全国才出现了适应农业学大寨需要的有关农村人民公社财务会计的小册子，建国以后 17 年里建立起来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也被践踏破坏，创深痛巨，奄奄一息。

1976 年以后 在拨乱反正过程中 逐步克服了“左”倾错误的危害和影响，清除了各种诬蔑经济工作和会计核算的谬论。党中央和政府提出，不能以阶级斗争替代经济管理，不能以政治挂帅替代会计工作，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的指导思想。会计界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着手进行了整理和恢复工作。被下放的会计专家、教授和财会人员陆续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各种财会制度逐步得到恢复，会计核算和会计分析的质量也开始有所提高。同时 学术界开始编写新的会计教材 对会计基本理论和方法进行整理和修订。厦门大学会计系在 1978 年率先出版了《会计基础知识》一书，这标志着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开始走出低谷，步入正轨。

1978 年 12 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作出了把我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活跃的政治气氛和党中央将经济工作放在首位的决策使许多会计专家和教授欢欣鼓舞，他们重新焕发了青春，积极开展会计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会计研究开始迸发出勃勃生机，这预示着会计研究的春天又来到了。

第二节 1966 年~1978 年会计理论研究特征

这一时期是我国会计研究停滞发展和会计思想凝固的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几乎没有什么会计研究工作。据统计，1966 年出版的 8 本教材，考虑到出版的周期，实际上是在前阶段完成的，